

《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

書評

(臺北：時報文化，2015)

歷史三 梁凱棋

一、作者背景介紹

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生於一九四一年，出生於二戰期間，並在兩次世界大戰所遺留下來的陰霾下成長，她對祖母用了整個漫長的人生去哀悼她那位喪生於一九一七年復活節戰役中的丈夫的印象最為深刻。戴安娜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的榮譽退休教授，她專注於中國桂系和民國史之研究，其著作為一九七五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的《中國政壇上的桂系》(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為西方學術界最早研究中國桂系的英文著作。

二、摘要

本書主要講述八年抗日戰爭為中國人民所帶來的各層面上的傷害，作者將其論述分為社會體制之崩壞、社會結構的改變、戰爭對社會和家庭所帶來的傷害和人民在戰爭下的情感四個主要部分，以大量篇幅去講述戰爭時中國人民如何受到中日兩方所帶來的痛苦。雖然作者希望讀者將重點放在遭受侵略的中國人如何看待這場令他們的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的戰

爭，但仍指出其認為抗日戰爭所造成的社會體制的動蕩為中共帶來了養份，給他們提供了一個理由去建設新社會，為日後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線。直至日本在 1941 年 12 月偷襲珍珠港，迫使美國加入戰爭，先後在長崎與廣島投下原子彈，逼使日本無條件投降，二戰才告一段落，然戰爭結束並不表示中國人民的生活能夠回歸安穩平靜，而是代表著國共內戰的開始。

本書有別於其他專注於分析抗日戰爭的爆發成因或將戰爭的責任歸咎於任何一方的論述，作者將文章的重心放在飽受戰亂侵擾的民眾上，透過戰爭中的片段以喚起人們對於那場歷時八年多的浩劫的記憶，希望人們了解到戰爭不僅會造成即時性的、災難性的破壞，還會衍生各種後遺症，提醒人們必須謹記從戰爭中所領悟到的教訓，切勿重蹈覆轍。故此，在文末作者寄語世人，國家的共同記憶是重要的，不要忘記這場人間浩劫，每件事都有其歷史意義，今天我們所面對的國際局面都是過去所發生的事編織而成。

三、篇章結構

本書的篇章結構是按照時期順序排列，每一個時期皆以軍事和政治事件分隔，並依順序分為六章，下文將詳述本書架構。

(一) 第一章以 1937 年 7 月至 12 月劃分為一個時期，作者形容這一個時期為中日兩國戰事的「高峰期」。1937 年 7 月 7 日，中日兩方於北平的盧溝橋發生劇烈衝突，史稱「七七事變」，掀起中日戰爭的序幕。戰事初起，人民雖然對於國家形勢的急劇轉變和稱霸海陸空的日軍而感到驚慌失措，但面對打著「阻止社會主義蔓延亞洲」的旗號而全面侵華的日本，中國人民仍然士氣高漲，本著「還我山河」的精神應戰。這個時期大量人民為了逃生而離開自己的城市，往尚未遭受日軍蹂躪的地區移動，大量難民相繼出現，因此政府除了忙於應戰，也必須處理糧食和物資分配的問題。人民除了要忍受與家人離散和水土不服的痛苦外，在自由地區的人也要應政府之要求讓出大院落、寺廟、祠堂、居宅等作為臨時學校、政府機關、收容所、醫院之用，而他們卻無法在事後要求政府作出任何補償。這六個月來，中國人民在沒有心理準備下迎接戰爭的開始，承受日軍的轟炸

和屠殺，被逼離開自己熟悉的家鄉四處逃亡，種種迫害使人民明白到若不把日本人趕出中國，戰事就永無結束之日，因此他們寧死不屈、拼死抗敵。可惜，這只讓日本人意識到必須加大侵略的力度，才能加快中國投降的速度。

(二) 第二章以 1938 年為主線，講述在第二年的戰爭中，中國政府為了扭轉失利局面而採取的戰略行動，以及中國在戰事持續失利中所分裂出來的兩種人。中國在戰事上持續失利，被迫不斷向後往內陸地區撤退，政府採用堅壁清野的焦土政策—以空間換取時間：1938 年 6 月，為了阻擋日軍前進，中國決定採用「以水代兵」的戰略，掘開黃河花園口的堤壩引發洪災，成功爭取時間讓中國軍隊撤退。同年 11 月，傳聞日軍正在逼近長沙，於是國民政府率先火燒長沙，以防落入敵方手中。眼看中國在戰事上持續失利，有人傾向相信中國不敵日本，為求生存而轉投敵人懷抱：汪精衛是有名的「漢奸」，幫助日本在南京建立傀儡政府；周作人認為中國在這場戰爭只是垂死掙扎，故拒絕隨中國軍隊撤出北平，在北平淪陷後仍舊繼續他的工作，並與一日本女子組織了一個家庭，受到當時其他知識份子的鄙視；在淪陷區的農村人民，為了生存下去而選擇「與敵人共存」，即當時身處自由地區的人口中的「亡國奴」。¹無論是哪一方的人，這都反映著中國人民在這場世紀浩劫中並沒有選擇離場，而是想盡辦法生存下去，直到戰爭結束的那天。

(三) 第三章以 1939 年至 1941 年為主線，講述中日兩方陷入了僵持的局面，戰爭進入「瓶頸期」。戰線隨著中國軍隊的撤退而向內陸轉移，日本的機械化部隊難以在地勢險要的山區發揮大規模的攻擊，於是大型戰役的時期結束，游擊隊成為戰爭的新領導角色。過往政府的行政重心從未落在中國西部，卻因戰爭而意外地與外界有所聯繫：重慶成為臨時首都、桂林成為文化要津、昆明成為學術中心；社會結構因人口轉移而重整，人口對物資的需求急遽，帶動了貧窮農村的經濟發展；原在華東地區是中產階層的有錢人在走難的過程中變成窮人，只能寄居在農民的家庭。重慶受日軍轟炸超過兩百次，雖然人們在反覆轟炸中逐漸組織了一套面對空襲時

¹ 戴安娜·拉里著，廖彥博譯，《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第 124 頁。

的處理方法，但接連而來的襲擊仍然造成大量傷亡和破壞，中日戰爭期間受空襲而傷亡的人數總共超過二十萬。這些數字反映著無數家庭因成員傷亡而遭到分裂，失去家庭的庇護後會有孤兒、慰安婦的出現，而到今天這些人道問題仍然未能得到解決。

（四）第四章以 1942 至 1944 年為主線，作者稱這段時期為「陰鬱的年份」。這段時間發生了一件大事：日本在 1941 年 12 月偷襲珍珠港，迫使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在這段期間主力應付太平洋戰爭，甚少在中國境內發動戰事，國共之間的合作關係漸趨脆弱而陷入分裂。隨著香港在 1941 年 12 月 25 日落入日軍手中，唯一的糧食物資的運輸路線被切斷，物資短缺的情況惡化，導致中國大陸通貨膨脹嚴重：1938 年 5 月 100 元法幣尚可買到兩條耕牛，到了 1944 年 100 元卻只能買到一小袋米。²人民產生厭戰情緒、士氣低落，禍不單行的是河南此時爆發了大饑荒，超過三百萬人餓死，「狗不咬，雞不叫，井水枯，河水乾，樹落葉，草麥枯，天無雲，黃風起」，³恍如人間煉獄。戰爭的影響終於在這一時期全面爆發，大饑荒、物價飆升、物資貧乏等原因催使人民四處出逃，大量難民湧入周遭省份，各地社會結構因而再次重組，然中國政府久經戰事後已無力出手救援。

（五）第五章以 1944 至 1945 年為主線，這段時期被視作中日戰爭的轉捩點。1945 年 8 月，美國先後在長崎與廣島投下原子彈造成極大規模的破壞，使日本無條件投降。此時，日本卻動員超過五十萬人，在中國本土發動了最後一場戰爭——「一號作戰」，導致中國死傷近十萬人，重創國民軍，意外的是共產黨沒有在這場作戰中遭受一絲損傷。國民黨經歷數年戰事已民窮財盡，加上受到日方一號作戰的重創，軍事實力被消耗殆盡，已經無法與蓄精養銳的共產黨匹敵，中共統治的時代來臨。面對戰爭即將結束，人們尚未從過去八年的苦難中鬆一口氣，就要擔心未來的日子：城市一片頹垣敗瓦、政府機關架構失散、社會經濟解體、通貨膨脹等，而受物價影響最深的是月薪制的教師、公務員等等，他們的薪水趕不上通脹；反而日薪制的苦力和自給自足的農民受到的影響最少。而第二次國共內戰亦

² 戴安娜·拉里著，廖彥博譯，《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頁 211。

³ 劉慶昭，〈民國三十一年鞏縣災情及救災〉，《河南文史資料》，第十九輯(1986)，頁 156。

隨即展開，或許是因為日本侵華對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傷害太大，內戰的影響已無關宏旨。

（六）第六章以 1945 年至 1946 作為主線，為戰後初期歲月。戰後，政府要統計戰爭罹難者的身份和數量，但由於數目過於龐大，只可以根據中國官方的人口統計數字作前後對比，因此戰時的傷亡與失蹤人數並不精確，官方估計中國人口減少超過 1800 萬。⁴而文物方面，絕大部份的中國古蹟都得以倖免，如萬里長城、紫禁城等，但有超過二千萬冊圖書文物在戰爭期間消失，其中極具歷史價值的《四庫全書》被運至東京；相比起文物，私人財產的損失難以計算，而絕大部份都無法獲得補償。政府亦開始展開接收各地各省的行動，惟香港在戰後仍然由英國接管，臺灣也形同被「劫收」：日本產業被充公、臺灣人的財產也被佔領，彷彿只是另一個殖民者的到來。勝利沒有為人民帶來喜悅，因為要處理的爛攤子實在太多，還要面對另一場內戰，苦難仍未結束。

（七）作者在最後作了一個總結，重申記憶的重要性，解釋為何我們要重建過去。作者解釋「為何國家要正視歷史？」，乃因我們要承認過去所犯過的錯誤，才可以作出補救，避免往後重蹈覆轍。中國政府審判了江青等四人幫，平反了文化大革命，對受難者作出補償，這些舉動並不會令文革所造成的傷害消失，但可以安慰人民，和帶領國家繼續向前進。抗戰所遺留下來的影響力，至今仍然相當深遠，所以作者認為我們不應忘記這段歷史。

四、研究方法

作者所使用的史料類型非常廣泛，她採用了《末次剪報》、中方官方記錄、民間日記或傳記（西方記者、傳教士、外交官等）、《文史資料》作為本書的研究資料。雖然，這些傳統史料的內容，如《文史資料》，對於普遍讀者而言，或較為艱澀難懂、沉悶冗長，未必所有讀者都可以透過這些史料想像當時的人民所面對的困難。另外，作者認為日本的歷史材料很多時候都不會記載戰時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對於她研究中國百姓在戰

⁴ 劉慶昭，〈民國三十一年鞏縣災情及救災〉，《河南文史資料》，頁 294。

爭期間所遭受到的痛苦的幫助有限，故此在書中她並沒有選用日本方面的資料。

作者認同麥可·貝里所主張的「以藝術手法表達暴行，從苦痛與犧牲裡獲得啟發，在廢墟中得到成長，書寫他們各自的故事，從當中會興起一種新的文學形容，那就是『歷史敘事』」，⁵因此作者在撰寫本書時有運用到當時的小說、詩歌、電影、照片等等。本書使用當時的小說和詩歌作為歷史材料，雖然小說的內容通常為虛構，但其故事所採用的背景值得參考，可以一探當時的社會背景，從而與其他史料的背景進行比對，便可以窺探該史料的真偽，辨別其可信程度。而且，小說、詩歌等史料的內容較為生動豐富，比起艱深冗長的傳統史料更容易令讀者理解。作者選擇將小說或詩歌放在章節的中間或末端，不僅在較長篇幅的章節中起了緩衝作用，還能讓讀者在讀完整篇章節後更深入了解當時社會的背景，以及時人生活的情況，增加文章的吸引力，讓讀者更加投入其中。

此外，為了讓普羅大眾聽見身陷戰爭煎熬的平民的聲音，作者撰寫本書時最重要的來源是口述史料。作者走訪中國，記錄經歷過抗戰的人們與其後代的口述回憶，將他們的感受與精神匯合成書，讓受害者的戰爭記憶得以面世，藉此警告世人戰爭的禍害深遠，切勿重蹈覆轍。作者也在文中加插了不少成語和語錄，目的是「以總結一種情況或是某種態度」。⁶

最後，為了了解戰禍災難中的人們如何自處，作者運用法國社會學者布迪厄的「社會苦難」和「創傷理論」等概念，不如過往的學術研究多以疏遠的立場去看待研究對象，而是希望以同情、憐憫的目光去檢視中國人民在這場戰爭所經歷過的苦難，以及這些創傷經驗如何令中國人民對於「亂」所產生的恐懼、不安、無助、焦慮等負面情緒。

⁵ 劉慶昭，〈民國三十一年鞏縣災情及救災〉，《河南文史資料》，頁 32-33。

⁶ 劉慶昭，〈民國三十一年鞏縣災情及救災〉，《河南文史資料》，頁 34。

五、個人析論

世人皆善忘，亦因善忘，故不知痛定思痛。誠如馬克思所言：「歷史會重複，第一次出現乃悲劇，第二次便是鬧劇。」，自 1945 年中日抗戰結束距今已逾 77 年，當年那些為了在戰亂中活命而隨家族四處奔走的小孩，今天已是杖朝之年，可戰爭所帶來的遺害卻仍然揮之不去。中國人那引以為傲的堅毅不屈的情操在漫長又泯滅人性的連場戰事中被磨蝕殆盡，無論是國家或家庭、理性或情感、政治或個人都被深陷在戰爭的無盡漩渦中，或攪爛成泥、或體無完膚、或久延殘喘，無人、無事、無物可以在這場戰爭中倖免。

戰爭無疑是殘酷的，無論責任歸咎於哪一方，最無辜的仍然是被捲入戰爭中的平民百姓。可悲的是平民沒有掌握權力的核心，亦非戰爭中的既得利益者，被剝削的一群永遠都不會成為受人關注的主角。往後對於這場戰爭不勝枚舉的學術研究中，平民只是一堆數字、一些數據，沒有人關心他們身亡命隕之前的遭遇，死去的人民只是國家與國家的勢力鬥爭下的犧牲品。因此，我認同作者盡心竭力地將深受苦難的中國人民的經歷公諸於世，但我未敢苟同本書的部份論述。

首先，恕我不能認同作者不採用日本方面的資料的理由。作者提及到她沒有採用日本方面的資料，「因為這些資料很容易就忽略了占領區百姓遭受的苦難」。⁷我認為在研究過程之中投放過多個人情感而排斥某些史料來源會導致史料無法發揮其有效的價值，歷史事實也就無法彰顯。雖然，作者有提及到她希望以憐憫、同情的目光去看待中國人民所遭受到的苦難，但我認為採用「社會苦難」之研究概念與採用日本方面的史料兩者並無衝突。只因為資料來源是發動戰爭的一方就否決其史料價值，推翻了所有事實的可能性，此舉無異於以一竹竿打翻一船人。陳鵬仁教授所翻譯的《鐵蹄底下的亡魂—日本兵自述的侵華暴行實錄》一書，翻譯了曾參與過侵華戰爭的日本兵之口述回憶，書中所採用的照片的出處有二：一是取自日本每日新聞社所出版的「一億人的昭和史」畫刊，二是取自從日俘身上所搜出的照片。陳鵬仁教授在本書的序中說道：「……此將為歷史作證，

⁷ 劉慶昭，〈民國三十一年鞏縣災情及救災〉，《河南文史資料》，頁 32。

因為這是『兇手的自白』，不是我們危言聳聽。」⁸說明即使採用日本方面的口述回憶，也是一個歷史的見證，證實日軍在戰爭期間曾經喪心病狂地對中華民族犯下不可饒恕的暴行。

另外，於 1984 至 1997 年在日本留學的中國退役軍人方軍，在留學期間鼓起勇氣面對中國蒙受國難的過去，積極地接觸曾經參加中日戰爭的日本兵，希望在這些「鬼子兵」離世之前盡量訪問他們在中國的親身經歷，並將這些採訪記錄集成一本極有歷史價值的紀實作品—《我認識的鬼子兵—一個留日學生的札記》，期望世人永遠地記住這段歷史，不再發生相同的悲劇。鈴木作為一個曾參與過侵華戰爭的日本士兵，他希望回到山西那條曾被屠殺的村子，面對那段不堪回首的惡夢，為那些無辜受害的靈魂祈禱，使自己的心靈得到安靈；在上海到南京的途中不斷拚殺的野崎認為，由於當時的中國人民拼命抵抗，日本兵迫不得已地才殺害他們。此番言論聞者嘩然，豈不是日軍殘害中華人民的證據嗎？由身為施暴者的日本兵的口中說出曾對中國所做過的暴行，這番證供還不夠說明力嗎？我相信，當我們心存一個既定立場，而去排斥某些來源的史料，就很容易錯過一些重要的事實。

作者又提到，她在撰寫本書時用了許多來自西方記者、傳教士、外交官的手寫日記或傳記作為歷史材料，而這些外國文件都需要經過翻譯，但翻譯過後的内容未必與原文意思相同，在後人的理解中難免產生誤會。作者在書中有引用到《龍口黨史資料》、《泉州文史資料》、《廣西文史資料》等中方的官方記錄，雖然是最為重要的史料來源，但國家通常都不會公開其機密檔案，而且這些官方記錄格式千篇一律，有時流於形式，未必是最客觀的史料來源。故此，採用多方面的史料是必不可少的，互相比較不同角度的論述，從而獲得最客觀、最接近事實的資料，才對得起無數隕落的亡魂。戰爭使人變成了鬼，「日本鬼子」是當時令中國人民感到毛骨悚然的存在，故此這些鬼子的自述最能證實他們在中國所留下的痕跡是何其殘暴，不僅為中國數代人民帶來了無盡痛苦，也讓日本的後代被迫承擔了上一代所種下的孽障和仇恨。

⁸ 東中志光著，陳鵬仁譯，《鐵蹄底下的亡魂—日本兵自述的侵華暴行實錄》（臺北：黎明文化，1982），頁 2。

戰爭會泯滅人性，身陷戰爭的人們會喪失理智，因此這場戰爭注定是一場悲劇。日本的當權者鬼迷心竅，急於擴大日本勢力，對擁有豐富資源的中國虎視眈眈，貿然對中國發動了戰爭；日本國民為了成就帝王的夢想而盲目執行命令，無數青年奪去了他國人民的生命而手染鮮血，也將自己的青春葬送在異國。有些人在戰後清醒，終生活在悔恨之中，有些人仍然執迷不悟地認為自己只是聽從上級指示，又何錯之有？有些人永遠停留在那場慘絕人寰的戰爭之中，倖存者則肩負著家破人亡、破產蕩業的壓力在戰亂中惶惶不可終日，本來應該保護自己的政府為了抗敵而犧牲國民，長沙大火和花園口決堤帶走了十多萬條生命，雙方夾擊所造成的傷害難以言喻。無論如何，歷史已經不能再重寫，逝者已矣，生者何堪。縱使我們都希望每一個曾經有血有肉的亡魂可以得到該有的重視，但這場戰爭的慘烈超乎想像，侵華期間所造成的破壞難用文字概述，過於龐大的死亡人數甚至得不到準確的記錄，只能靠每座城市的戰前人口與戰後人口作對比以推斷出大概的死亡數字。

我認為本書優秀之處，在於作者沒有憤憤不平地控訴日軍暴行，也沒有故意誇大中國人民的遭遇，只是平靜地、理性地講述中國人民在日軍侵華期間之所遇，分析他們如何去面對這場戰爭、如何在戰爭中生活、每個人對於日軍的態度有何不同、戰爭如何幫助共產黨鞏固地位，甚至最後可以擊敗國民黨掌握政權，毛澤東面對日本首相，笑說「如果日本沒有侵略中國，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勝利」，⁹姑勿論毛此番言論是否諷刺，卻也是事實。然而，更讓我感到難過的是書中所提到的抗戰後臺灣人民的遭遇。中國自甲午戰爭戰敗後，臺灣便作為條款割讓給日本，直至二戰後才結束日本五十年來的殖民統治。書中提到，「臺灣是中國大陸怒火宣洩的目標……臺灣幾乎完全和中國隔絕，而臺灣人也被初來乍到的大陸人看作是敵人陣營的外國人。」¹⁰自清末起，臺灣人民就失去選擇自身的命運的權利，先被清廷拋棄以作為和解的條件，後在中日戰爭中被當成日本國民，臺灣被迫為政府承擔了其失敗管治的結果。可惜，國民政府在戰後接收臺灣後，卻將臺灣人當作外人，搶奪臺灣人的政府職位、外省人處處歧視臺

⁹ 東中志光著，陳鵬仁譯，《鐵蹄底下的亡魂—日本兵自述的侵華暴行實錄》，頁 350。

¹⁰ 東中志光著，陳鵬仁譯，《鐵蹄底下的亡魂—日本兵自述的侵華暴行實錄》，頁 292。

灣人。臺灣在戰爭期間明明也遭受到空襲轟炸，在連場戰事中也備受摧殘，戰後卻得不到該有的安慰。國民政府不思進取，將失敗的管治手法帶到臺灣，導致臺灣本土在戰後僅一年多就爆發二二八事件，隨即政府宣佈戒嚴，白色恐怖席捲而來，籠罩了臺灣足足四十餘年，受政治迫害而罹難者保守估計達二十萬人。對於臺灣人而言，一個殖民者的離場，換來了另一個政權到來，那個政權又是否合乎他們的期望？是否有獲得該有的民族尊嚴？

最後，我雖然不同意作者在採用史料時的部份主張，但我仍然認為這本書是一部寶貴的作品，將龐大而雜亂的資料整合成書是一件極費心力的工作，作者盡可能將每樣資料分門別類地述說，方便讀者順著歷史脈絡閱讀。戰爭的遺緒影響至今，作者重申「直到這場戰爭所帶來的種種遺緒全都耗盡以前，抗戰必須被繼續當作是一場大浩劫」，希望世人謹記這場戰爭所種下的惡果，並不會隨著戰爭結束就消失，所以我們必須正視這些事實。

願以史作鑑，後世永遠不再出現類似的噩夢。

參考文獻

1. 方軍，《我認識的鬼子兵：一個留日學生的札記》，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7。
2. 東中志光著，陳鵬仁譯，《鐵蹄底下的亡魂—日本兵自述的侵華暴行實錄》，臺北：黎明文化，1982。
3. 戴安娜·拉里著，廖彥博譯，《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臺北：時報文化，2015。

